

法国宋史研究与年鉴学派的互动

戎恒颖

【摘要】法国年鉴学派对近百年来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三十年,《年鉴:历史与社会科学》陆续刊发了六篇蓝克利教授关于宋史研究的文章,但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蓝氏深耕宋史研究领域三十余年,在宋代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政治史、制度史、财政史等各个领域都有重要的学术突破,也为法国宋史研究与年鉴学派之间的史学理论对话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借鉴以蓝克利为代表的法国宋史研究,既有助于关注此学派社会科学研究趋向、长时段历史观察方法对法国宋史研究的影响,亦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法国中国史研究成果如何反哺年鉴学派史学理论的了解。

【关键词】法国宋史研究;年鉴学派;蓝克利

【作者简介】戎恒颖,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上海200433)。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24.6.146~156

法国年鉴学派对20世纪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年鉴学派早期以经济社会史研究为中心,强调长时段的考察,反对以往以“事件史”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史研究。国内对于年鉴学派各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已有相应的引进与介绍,但尚未引起国内学界足够重视的是,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曾鼎立支持并推动了白乐日(Etienne Balazs, 1905-1963)的全球“宋史研究计划”,同时法国宋史研究对布罗代尔提倡的“文化圈”研究有奠基意义,可以说是年鉴学术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三十年来,《年鉴:历史与社会科学》(*Annales: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期刊陆续刊发了六篇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 1950-)教授有关宋史研究的文章,尚未引起国内学界足够重视。从2011年至今,蓝克利与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1924-2014)、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1929-2023)等共同担任《年鉴》学术编委。蓝氏深耕宋史领域三十余年,在宋代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与财政史等各个方向都有重要突破,也为法国宋史研究与年鉴学派的对话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15年《年鉴》创立70周年的特刊上,蓝克利从中国史研究的角度参与了年鉴学派回归“长时段”的学术讨论,从中国史研究的角度反哺年鉴学派史学理论,这一次的交流引起欧

美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2022年初,蓝克利出版了《中国通史——宋代卷》,隶属法国“美文书库”(Les Belles Lettres)出版社的中国朝代史系列,该丛书是法国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中国史系列。蓝克利独立撰写的宋代卷共816页,是法语世界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整体关照宋史的皇皇巨著。^①

本文将蓝克利的宋史研究为中心,探讨法国宋史研究与年鉴学派的互动。从宋史研究的层面而言,通过借鉴以蓝克利为代表的法国宋史研究,可以从法语学界的视角,与引介已相当丰富而系统的英语、日语学界宋史研究视角作补充,丰富宋史研究的书写范式与问题意识。从海外汉学研究的层面而言,是将法国对宋代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与影响国际历史学界相当深远的年鉴学派联系起来。一方面关注年鉴学派的社会科学研究趋向、长时段的历史观察方法对法国汉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关注以蓝克利为代表的法国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如何反哺年鉴学派的历史学研究。

一、法国宋史研究的学术史背景及其与年鉴学派的学术渊源

法国宋史研究的起源,应从白乐日的“宋史研究计划”开始。虽然之前已有诸种宋代文献的翻译^②,但有规模、有理论指导的宋史研究,还是应当自白乐日

起始。

白乐日生于匈牙利,曾在德国进修汉学,师从弗兰阁(Otto Franke, 1889-1980)。二战期间流亡至法国,师从马伯乐(Henri Maspéro, 1883-1945),1955年加入法国国籍。其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古代经济史,文献功夫深厚,善于运用“中国的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和学者的论述以及各类史料文献来论史治史”,“对人们理解较长时期内的中国历史发展做出了贡献,其研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③

1955年,白乐日获得法国高等实践研究学院(EPHE)第六系教职,主持“中华帝国制度”讲座,同年在布罗代尔的支持下,白乐日正式推出了“宋史研究计划”这一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参与者包括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各国宋代研究重要先驱:宫崎市定^④、刘子健、柯睿格等。

现存白乐日与布罗代尔的通信,从1954年至1962年,近二十封^⑤,可以看到两人的学术及私人交往时间将近十年。布罗代尔曾多次写信,请白乐日提供有关中国研究方面的书单与资料,并提出一些他在理解中国历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白乐日都会第一时间写信回复。白乐日对布罗代尔作品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布氏的两部作品中:其一是布罗代尔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在1979年全套三卷本自序中,布罗代尔写道,该书旨在将欧洲的各方面与其他主要文明进行比较,书中对于中国的认识主要仰仗白乐日、谢和耐和龙巴尔(Denys Lombard, 1938-1995)。其二是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⑥(*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作为布氏受法国教育部委派撰写的、面向法国中学生毕业班的教科书,其中包括长达47页关于中国的介绍。在此撰写过程中,白乐日为布罗代尔提供了多种文献,解答了其在写作中的诸多疑惑。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法国的历史教育体系中,相当一部分历史系硕士、博士毕业生会先到中学教书,后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从事教学和科研。所以法国面向中学的教科书也同时面向中学教师,以及未来的大学学者,对成长中的历史学专业年轻学者的影响不容小视。^⑦

布罗代尔与白乐日的共同点是坚信经济史、社会史是长时段比较史学的最佳切入点,他们都坚持通过了解过去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他们相信集体的、跨国的协同研究的价值,此外两人都有一种天才的说服力,可以集聚研究所需的各种人力物力。^⑧另外,白乐日能够迅速准确地理解布罗代尔提出的关于中国的

问题,即便这些问题有时并不是汉学家所常问的问题。他力图对宋代社会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以及宋史研究计划背后的科研集体化的构思,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年鉴学派所提倡的“总体史观”以及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创新思想,亦符合当时法国高等实践研究学院第六系的经济与社会科学学术导向。

当时法国高等实践研究学院第六系正是年鉴学派的研究重镇,布罗代尔在吸纳白乐日为教授后,在他的宋史研究计划构想基础上,提出了宏大而富于创新性的“文化圈”研究(Aires Culturelles)项目计划,作为一整套计划申请研究经费。该研究计划不同于美国式的“区域研究”,而是更广泛地基于历史地理的考量,“把地理、历史、时间、空间以及‘长时段’理念通盘考虑”。1955年,肇始于白乐日宋史研究计划资助申报的意图,六系“文化圈”项目正式启动。委员会由系主任布罗代尔等人组成。^⑨

布罗代尔曾在《年鉴》上亲自简明扼要地介绍宋史国际研究计划,并为白乐日主导绘制的“中国11世纪末商业中心地图”(Une carte des centres commerciaux de la Chine a la fin du XIe siècle)作引言。^⑩布罗代尔阐述了宋史国际研究计划的重要性,并强调这张地图放在世界范围内看,也是一张“令人惊叹的经济史地图”。在结尾处他写道:“即使地图上的数据可能后续会有更新,但这张地图是认知中国‘这一未知之地’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宋史研究是年鉴学派宏大学术版图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创始人白乐日是国际宋史研究的奠基人。60年代白乐日不幸早亡,现法国学界公认其学术继承者是蓝克利。^⑪蓝克利又直接师承法国汉学大师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2018)以及史学大家贝尔纳·勒帕蒂(Bernard Lepetit, 1948-1996)。^⑫谢和耐的作品具有年鉴史学第三代“从地窖到顶楼”的鲜明特色,勒帕蒂则是年鉴学派第四代代表学者,是年鉴学派回归社会史的核心人物,加之白乐日曾是布罗代尔最倚重的中国研究合作者,蓝克利的学术兼具了年鉴史学第二、第三、第四代的学理所长,可谓集年鉴史学之大成,然又不为年鉴学派理论范式所局限,能够进一步加以批判地将其理论运用到中国史,尤其是宋史研究中来。

如果说白乐日在与布罗代尔的合作中更多是向布罗代尔提供有关中国的知识支持,那么蓝克利的研究则更进一步,通过对中国更深的理解,在思想和理

论层面反哺了年鉴学派。

二、蓝克利的宋代财政史研究及其与法国财政史、货币史研究的互动

蓝克利出版于2003年的《宋代的税收制度、公共收支与财政政策》^③完整翻译了《宋史·食货志·会计门》，法国汉学界公认其翻译典雅而精准，将技术性极强的文本通过充分的阐释与典雅的译文呈现给读者，鄂法兰(Françoise Aubin, 1932-2017)作为白乐日的学生与学术合作者，在书评中称这本书是“倘若白乐日得见，亦会高度赞赏的大作”。^④该书是欧美学界第一部宋代财政史文献译著，2004年获得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

该书对“会计门”进行了逐字完整的翻译，并就原文中涉及的专业术语附有大量阐释性脚注，另专设三章研究性论述，分别围绕宋代的经济史与会计文化、“会计”的词源学以及“会计门”的史学分析展开，体现了蓝克利对整个宋代财政与税收制度的通盘把握。该书的阐释性翻译与研究参考了梁太济与包伟民对“会计”的研究和修正^⑤，以及日本学界对《食货志》的研究。此书向法语世界提供了关于宋代财政制度的典雅而准确的译本，使法国学界的比较研究有了扎实的基础。

继这部专著后，蓝克利在宋代财政史方面陆续有重要论文发表，并且对法国财政史、货币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2006年法国经济与财政史委员会(Comité po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合作，举办“历史上的公共债务”会议并出版论文集，其中收录了蓝克利的论文《中国11世纪的公债、内藏与货币》^⑥，现在仍可以在法国经济部的网站上看到这本论文集，可以说蓝氏的宋代财政史研究对法国当下公共财政决策仍有参考意义。2007年，蓝克利参加法国“通过危机认识货币：过去与今日的货币危机”学术会议，发表论文《11世纪中国的官僚与货币：陕西的货币危机》^⑦，该论文被多位法国学者引用，如2008年被布鲁诺·泰雷(Bruno Théret)引用在其发表于法国《经济研究》上的论文《货币的三种状态：以跨学科路径探讨货币》^⑧，《经济研究》由巴黎政治学院主办，在法国学界与政治经济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布鲁诺·泰雷此文于2016年收录入《法国货币理论》^⑨一书，该书集中体现了法国1980年以来在货币研究上的代表性成果，是法国货币史研究必读书目，可以说经过布鲁诺·泰雷的转引，蓝

克利对11世纪中国的官僚与货币研究成为了法国货币史学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2012年《年鉴》发表的埃及史研究论文《罗马埃及的私人信贷市场、收藏图书馆和公共事务》^⑩，也引用了蓝克利这篇文章。

蓝克利《中国通史——宋代卷》第七章“交流的经济”与后文将分析的第八章是该书的核心章节。第七章整合了蓝氏三十余年来研究宋代财政史和经济史的成果，围绕由交易而产生的经济活动，重点突出了宋代城市的发展。他指出，宋代城市成为了经济和金融活动的中心，城市内各活动由此高度精细化。该章节亦重点探讨了由交易而产生的税收活动，包括由国家垄断和其他各种交易活动产生的纸币，以及由此产生的投机行为与通货膨胀。在这一章节的最后，蓝氏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宋朝是否从王朝转变为了财政国家(État de finance/financial state)?蓝克利对“财政国家”的思考是与刘光临研究的对话。^⑪蓝氏对于宋朝是否转变为“财政国家”提出不同意见，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史实的考量：首先，即使宋代纸币的发行助长了投机，但纸币既没有支付报酬的性质，也没有自愿持有的性质：它们被作为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弥补流动性的不足和预算的结构性赤字。其次，由于市场的不连续性和货币空间的分散性，金融市场是割裂的，并有强烈的价格变化。这一点鼓励了投机性的操作，正如11世纪“入中”支付的票据，但由于债务票据的期限很短，商人所获得的利润是有限的，且并不直接代表短期信用票据的回报。最后，尽管可以肯定的是诸如“入中”这样的财政活动可以被理解为国债，但这个系统是不连续的，是各级别行政部门根据他们需要和他们可能获得的利润分别组织的。换句话说，对国债的统一管理是不可能且无法想象的。因此，即便是对于财力最为雄厚的商人而言，在与政府的合作中，国债从来就不是稳定且安全地连接合作双方的纽带。蓝克利由此指出这也正是宋朝“重商主义”的模糊性所在。^⑫换言之，我们看到对于从税收国家发展成为财政国家的五个条件^⑬，蓝克利对第三点宋代债务票据的流通性，以及第四点财政管理体制的高度集权化与专业化持不同观点。

国内学界认为西方学者通常没有注意到，西方财政史上的一大重要现象，即军费开支飞涨引发的财政危机，进而推动国家公共财政体制变革，这一现象在中国早已发生。^⑭这一观察整体上是准确的，但蓝克

利是极少数关注并深入研究这一现象的西方学者。并且他对宋代的货币、税收、财政、公共债务的考察,对法国乃至欧洲货币史、财政史、经济史研究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蓝克利的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西方“活的制度史”对话之可能

蓝克利的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亦得到国际史学界广泛赞誉。他发表在《年鉴》的六篇论文中,三篇都关注了宋代政治制度史及其对其他领域的影响。^⑤蓝克利对宋代官员选任制度的研究^⑥,曾参与法国学界围绕国家治理(Science de l'État)的学术会议,成果于2000年结集出版。2005年法国俄罗斯史学者让-弗雷德里克·绍布(Jean-Frédéric Schaub)在其《现代国家的概念还有用吗?探讨比较史学研究中的若干障碍》^⑦一文中引用并探讨了蓝克利发表在《年鉴》的论文《礼仪、空间与财政——11世纪中国的主权重组》。2016年,在“权力与国家”的议题上,蓝克利与研究美国史、英国史、西班牙史等历史学者展开对话。会后与另两位学者共同在剑桥出版社主持出版了Serve the power(s), serve the state一书,并撰写第十章“宋代10至11世纪初武人官僚化”。^⑧2021年,在“9至17世纪的中国与欧洲政治信息沟通”会议上,蓝克利参与中国史与欧洲史对话,并于会议文集刊发论文《碎片化与财政中央化:四总领所的出现(1127-1165)》。^⑨

蓝克利对宋代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有机整合于《中国通史——宋代卷》第八章“宋代全新的主权建构”。值得注意的是该章节探讨宋代政治文化各面向的先后顺序,依次是:宫殿和宗室、皇后与嫔妃、内臣与武将、文官、皇帝(“在人与神之间”),台谏制度、政治合法性。作者解释如果以唐宋变革而言,应该从皇权的“绝对化”开始书写此章,但是本章基于“祖宗之法”的启发,先从作为政治空间的宫殿与宗室入手,继而介绍宫廷中的女性;接下来关注武将的权力,基于赵冬梅、余蔚的研究,指出武人官僚化与官僚体系中武官低等化,是一体两面。从武将权力探究宋代官僚体系的建构,又从财政角度探究君主权力的绝对化。

我们可以从该章的叙述逻辑中看到士大夫逐渐走向政治舞台台前这一过程,最后收尾于台谏制度与政治合法性。关于皇帝权力合法性,作者指出,宋朝皇帝权力面临着旧传统缓慢瓦解,新的“好政府”范式逐渐浮现的过程。宋朝如果要对标唐朝,宣称是同时期最具政治合法性的国家,就必须面对领土的不完整

性问题,这一问题迫使真宗需要通过天书来证明其天命,但是该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领土的不完整带来了政治权威的不完整,以及正统论的争论延续不断。士大夫需要给皇帝权力提供一个合理性、权威性的解释框架,并且试图证明自身在其中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涉及两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概念——“主权”和“权威”。作者指出在宋代士大夫向皇帝提供的解释框架中,最重要的是“国体”、“故事”与“祖宗之法”。蓝克利引述了郝若贝(Robert Hartwell, 1932-1996)所揭示的“故事”的意义在于将历史经验置于政治理性的中心,同时,他强调“国体”是士大夫与皇帝共同构成的,所以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的据理力争,并非是君主宪政的先兆,或民主政体批判文化的先驱。士大夫对皇帝“权力任性”的批评,出发点是对皇权的绝对尊重。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蓝克利的《中国通史——宋代卷》既是法国宋史研究的代表作品,也提供了观察法国年鉴史学的重要视角。美文书库的全套《中国通史》,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当下法国史学界普遍史的回归。具体到蓝克利的《宋代卷》,在总体史观的大框架下政治史占据了相当重要的部分,这不仅是蓝克利个人研究所长,相当程度上也可以作为观察年鉴学派动向的一个窗口,具体有以下六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本书的宋史书写是对年鉴学派总体史观的实践,作者在导言部分最后一句强调本书是“在中古亚洲总体史视野下书写宋代史”;

其二是在方法论上,本书的核心方法论是年鉴学派所重视的历史人类学。^⑩而历史人类学正是布罗代尔“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理论的延伸,是年鉴学派几大研究框架的交汇:社会经济史研究,心态史研究,以及对跨学科的重视。

其三是高度重视“政治文化”,集中体现在本书的核心章节,第九章“重建帝国、重构世界”的分章节,“宋之伟大”之“彻底政治的文化”小节;并且在结论部分结合西方政治学语境下的“政治文化”概念^⑪,与余英时先生的研究进行对话。

其四是本书上编的事件史,可以看作是呼应“叙事的复兴”。年鉴学派自第三代学者以来,对叙事的兴趣复苏,开始回归政治史、叙事史和事件史,事件不再仅是反映深层结构的镜子。正如彼得·伯克所言,年鉴学派“叙事的复兴”与“回归政治”是同步出现的^⑫,本书对政治文化的关注与对政治事件的叙述也

是相辅相成的；

其五是本书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取合适的时段，比如“长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史、思想史以及民间信仰方面^③；

其六是本书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年鉴学派对“局势”(conjoncture)的关注，但同时亦更为重视“过程”(processus)。年鉴第二代学者强调“局势”(conjoncture)，本书中该词出现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一是科举史方面，作者指出宋代将科举放置在朝廷政策的优先级地位，是出于对双重局势的考量：五代十国后期文治地位上升，宋统一南方需要展现对文治的重视；太宗转向士大夫的决定受到一系列事件的影响(高粱河事件等)。二是政治文化和思想史方面，宋儒对经典阐释的冲突，来源于对历史与政治局势的不同理解的冲突；三是宋代民间信仰的传播，概括而言即民间信仰的传播既依赖旧有的村落习俗，也受到新的地方与社会局势的影响。由于年鉴学派理论中“局势”往往对应短时段和中时段，我们可以从蓝克利的研究中观察到法国宋史学界在制度、思想、地方研究的领域对局势的关注。

我们可以看到蓝克利的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不同于北美、日本等其他海外宋史学者之处，是其年鉴学派的大背景，尤其是年鉴所重视的社会科学问题意识。那么西方思想史中的“制度”概念是否提供了打开宋代制度史研究的一把钥匙？蓝克利在纪念白乐日百年诞辰的文章中有一个关键的脚注，为我们整体把握其宋代制度史研究提供了答案。他引用了阿兰·盖里(Alain Guery)^④关于“制度”的概念史论文。^⑤该论文中梳理的西方思想史中的“制度”，代表了蓝克利制度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底色，笔者以为亦是中西方制度史研究深入对话的桥梁。

简言之，西方现代语汇中的institution一词是静止的制度，而蓝克利所引阿兰·盖里的论文则强调，在拉丁语词源中，“制度”本身就是动态的，就是“活的”：

今天，当我们讨论制度这个词最普遍的意义时，我们指的是维持一种社会状态的有组织的结构。这种普遍的含义与它的词源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它是静态的，而“制度”最初有一个动态的含义。它指的是建立和组织这些结构的过程本身。这个词来自拉丁语动词*instituo, instituere*，是*in statuo*的缩略语：“放置在”，安装。因此，它指的是一种运动，它先于一种静止情况，并不等同于后者。

我们可以看到蓝克利将中国史料介绍给西方读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在提醒西方读者，西方传统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由此中西方学术交流的意义不仅是了解对方未知的过去与传统，有时也是通过对方的传统来照见自身被忽视、被熟视无睹或被遗忘的传统，或者借机反思自身传统存在的多义性。

四、蓝克利《年鉴》六文对年鉴学派历史地理与史学理论的贡献

蓝克利发表于《年鉴》期刊的论文自1991年始，三十多年来共发表六篇论文^⑥，分别是1991年的《北宋的领土管理与榷茶制度》、1996年的《礼仪、空间与财政——11世纪中国的主权重组》、2003年的《法国边界，中国视角》、2004年与邓小南教授合著的《“祖宗之法”：中古中国的皇帝权威与政府》、2011年与董晓萍教授合著的《水权的形成：华北的历史、传统与创新》，以及2015年在《年鉴》创刊70周年特刊上发表的《长时段与年代深度》。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年鉴》改版，改版后的第一期有一篇编委集体撰写的改版社论(*éditorial*)，当年蓝克利与雅克·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同为学术编委。社论首先阐明了《年鉴》在当下学术界面临的挑战，为了使《年鉴》依然能够对历史研究有引领和启发作用，提出接下来三个发展方向。其一是重视对方法论的反思，历史学不仅靠新发现的史料推动，更是靠新的问题意识推动；其二是重视跨学科前沿对话，历史与社会科学跨学科对话重点是要把握社会科学的前沿变化；其三是重视将视野拓宽到欧洲以外的领域。可以说这三点都与蓝克利的宋史研究息息相关。

在此我们集中探讨蓝克利2003年中国与法国历史地理的比较研究，与2015年基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参与年鉴学派回归“长时段”的学术探讨两文。此两篇对历史地理研究、史学理论研究都有重大启发意义。

2003年《法国边界，中国视角》一文结合法国学者诺尔曼(Daniel Nordman)对法国16至19世纪法国边界的研究^⑦，对比了中法之间的异同。此处“边界”既指国家边界，也指国家内部的区域划分边界。该文的比较视野很有特色：中法的对比并非基于同时段的比较，蓝克利使用的中国史料是宋代的，主要在11世纪，如熙宁八年宋辽划界之争，而对话的法国研究主要围绕16至19世纪。这对我们研究中国史、欧洲史是一种启发，对比传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史学研究是否一定要基于同时性？是否可以拓宽思路？

蓝克利的论文指出,他本人作为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不得不重视历史与空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发展与领土构成的问题。在对话与借鉴法国学者的研究前,蓝克利首先回顾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传统,以及北美中国学的历史地理研究(相关代表学者的研究领域只能勉强被划分归入地缘政治或人类学^⑧),蓝克利着重强调了比较中法边界的困难,但也同时指出法国史的研究有助于开拓中国帝制时期研究的问题意识。法国史学界这些观点或许可以给中国史研究者带来启发:关注“空间自主性”,避免“地理决定论”,即任何一条疆界的划分,政治意志或许不是唯一的推动力,该区域的社会、经济等地方特性有很大概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接下来,就区域研究而言,蓝克利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大区理论(macroregion)展开对话^⑨,并从他对淮河流域的研究出发,通过对宋代淮河流域的观察,从水利史、区域经济史、财政史、地方的社会力量、政治力量的层层剖析,发掘淮河流域如何随着经济的发展,从一个核心区域转变为华北平原与长三角两大区域(macroregion)的边缘地带。

就国别疆界划分而言,蓝克利基于他对熙宁八年的宋辽划界问题研究对比法国史研究,首先表明其基本立场即中国的空间划分结果具有其独特性,法国史很难为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提供借鉴经验,但是具体到历史上的冲突协商过程则具有相当的可比性:冲突的两方在交涉谈判中往往会涉及不同的层面,边境地区通常相较两国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并且在社会、经济层面与两国都有深层连接;解决边境冲突最终达成的协议既要满足边境地区的地方习惯,同时又要调和两国矛盾;寻求妥协的过程一定是伴随着冲突,但目标是两国关系的稳定。从协商过程而言,传统中国的历史经验完全可以和法国进行比较。

蓝克利2015年发表的《长时段与年代深度》^⑩更趋于理论化,是法国汉学研究与年鉴史学理论的一次重要对话。该论文的撰写理论背景是哈佛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⑪和布朗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乔·古尔迪(Jo Guldi)撰文呼吁重新关注“长时段”^⑫,引发了国际史学界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广泛学术争论。《年鉴》在创刊70周年之际,围绕这一议题组织专栏探讨。蓝克利从其中国古代制度史、政治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参与了这一讨论。以研究史学理论和新文化史研究闻名的林恩·亨

特(Lynn Hunt, 1945-)也在该特刊发表了论文。

蓝克利指出,布罗代尔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史学界经历了几个著名的“转向”(turn),逐渐趋向于对历史进行片段化的研究,背后的客观原因一方面是学术界的发表压力,另一方面是史学推进过程本身越来越强的局部精细化要求。但是由于史学的碎片化,导致其与大众渐行渐远,当下如何让史学重回公众视野,重新参与公共生活,是一个重大的命题。

蓝克利首先回顾了“长时段”在布罗代尔的理论体系中,是一张无可替代的“王牌”。“长时段”研究是史学重回其统领社会科学地位的必经之路,使之获得与数学之于自然科学相对等的地位。^⑬在布罗代尔规划的年鉴学派理论架构下,历史学在整合其他社会科学的过程中,首先选择的是经济学,之后则逐渐与人类学合作日趋紧密。在这一系列的跨学科研究中,布罗代尔也同时将视野转向其他“文化圈”。蓝克利指出:“为了打好‘长时段’这张王牌,布罗代尔将长时段作为一个能容纳更为丰富的人类经验的大背景,这些人类经验诞生于产生近代社会科学的西方以外区域。社会科学希望能够解释这些人类经验,布罗代尔希望历史学能够成为社会科学的指引。”当然,研究人类经验的学科方法可以是人类学、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但是布罗代尔希望更突出历史学的重要性。为了使历史学科能够更好地成为包罗人类整体经验的学科,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必须得到重视。因为中国不仅有长时段的历史,而且中国对自身的解读是通过史学进行的。蓝克利为此转述了布罗代尔非常珍视的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私下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不关心中国,我关心的是人!”^⑭他继而在文中回顾了布罗代尔曾主导法国高等实践研究学院录用了一批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如白乐日、谢和耐等,这些汉学家的加盟是年鉴学派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

中国历史对年鉴学派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反之蓝克利也指出年鉴学派对“长时段”的重视也有利于中国史研究突破朝代时间框架的局限,观察横跨数个朝代的历史变迁(唐宋、宋元明等)。同时,“长时段”又不同于“冗长时段”(une pesante et paralysante perspective de longue durée),“长时段”的研究可以避免一种“一以贯之”^⑮的静态历史观。并且对于汉学这一整体学科而言,年鉴学派的理论与中国研究的结合,旨在把中国不再作为一个遥远的“文明”来看待,而是作为社会科学可以带着问题意识进行深入研究的对象。

当然,长时段研究也离不开恰当的时段划分。蓝克利指出,布罗代尔曾强调“年代深度”(profondeurs chronologiques)这一概念,对当下的研究仍然有指导意义,即时间段的起止点应该由问题意识来决定,而问题意识可以充分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从而确定最有利于深挖该问题的时间段范围。需要注意的是,此“年代深度”为复数,即同一事件通过结合不同的年代范围,可以做出多层级的解读。蓝克利强调,中国史料浩如烟海,如何在庞大的史料中结合社会科学提出恰当的问题十分重要,白乐日与谢和耐曾做出了出众的榜样。蓝克利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围绕数字人文的进展,展望了大数据对“长时段”中国史研究的前景与意义。

阿米蒂奇和古尔迪对《年鉴》特刊这组探讨《历史学宣言》的论文作了回应^⑥,最先回应的正是蓝克利的论文。该回应亦从回顾入手,强调布罗代尔是在其历史学家的职业和学术生涯巅峰时提出了“长时段”学说,在当时充满竞争的学术与思想舞台上,与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记者等,争夺中央位置。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之间相互冲突又面临普遍危机的背景下,布罗代尔以“长时段”理论捍卫历史学的地位,并整合社会科学各领域。这一回顾并非老生常谈,而是直接决定了阿米蒂奇与古尔迪号召回归“长时段”理论时的雄心壮志:面对历史学科在全球范围内、或者说是人文学科的普遍危机,他们提出的重新确立历史学价值与意义计划,是一种经过重新反思的“长时段”理论。而这一理论模型的启发意义和作为方法论的价值,需要史学界的广泛讨论,尤其需要研究西方文明以外的学者参与。

接下来是阿米蒂奇和古尔迪回应蓝克利的部分,开头是这样的:

为了使我们的文章简洁准确,我们有意将其限制在了我们熟悉的学术领域。但是我們希望能够激发来自世界其他地区、或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展开比较研究。这个愿望无疑实现了:卓越的宋代研究专家蓝克利对我们的文章作出了简明扼要的回。我们有意将我们的论文局限于我们熟悉的[历史时期和地域],但是我们非常荣幸地读到蓝克利给我们论文的评价是“毫无疑问是有益的”,并且以他汉学家的身份扩大了我们的学术视野。

而后阿米蒂奇和古尔迪表述了蓝克利一文观点对其理论的借鉴意义,概括而言有以下几点:“长时

段”研究的革新意义要避免被“冗长时段”的保守实践抵消;“长时段”能够使研究不同方向的历史学家团体之间得以交流,从事比较研究,并且使这些团体之间的关系避免成为主从关系;在诸如水利、人口迁徙等问题研究上,“短时段”研究与“长时段”研究是相辅相成的。

这一系列论文见证了以蓝克利为代表的法国宋史研究与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革新,以及国际史学理论有来有往的深度对话。另外,综合以上他发表于《年鉴》的各篇论文,我们可以看到以蓝克利为代表的法国宋史研究的影响力:这些以宋代史料为基础的论文,不仅有力推动了海外宋史研究,也代表了法国汉学的优秀成果,更是突破了国内研究的领域,与欧美各国研究其他地域和时期的学者进行了有效、深入的对话,并且在全球史学界反思历史学科的价值,反思人文、社会科学普遍危机的时刻,提供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回应。

值得指出的是,2015年《年鉴》组织的讨论在今天看来仍然很有启发意义。如果说阿米蒂奇和古尔迪呼吁回归长时段是为了回应历史学所面临的危机,那么近来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如火如荼,人文学科似乎又一次遇到了危机。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年鉴学派创始之初即试图回应某种人文学科危机,布罗代尔时期亦面临过种种对历史学、乃至人文学科的意义的普遍质疑。布罗代尔当时提出了“长时段”理论作为回应。蓝克利在《长时段与年代深度》一文中,提到了以CBDB为代表的数字人文,提到大数据能够给历史学者带来的可能性,另外字里行间也强调了年鉴学派一贯重视的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方法,似乎与我们当下有某种呼应。如何能够更好地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历史学科的研究相结合,如何才能不让数据所追求的“稳定性”淹没人类生活本来的不确定性,如何重视人类行动动机的多元性,如何把握人向机器“发问”的能动性,这篇并非直接为当下而作的文章似乎提示了一些有预见性的方向和建议。

此文的最后一段意味深长:

这些学术工具无疑极具重要性,这些网站使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能够长期保持联系,但它们本身并不意味着回归布罗代尔式的长时段。但是它们的重大意义在于使我们能够回应布罗代尔提出的挑战,即“在几个不同的年代深度上从事研究”。阿米蒂奇和古尔迪的呼吁无疑回应了布罗代尔的关切。然而,

想象历史学家在配备了这些新的望远镜之后,可以重新获得他们在被经济学家取代之前的关键地位,这是任何从事中国研究的历史学者都会犹豫的一步,因为研究中国的学者们都会记得,对辅佐君主的追求曾经给士人的知识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鉴于中国历史学者们为走出这个循环所做的努力,我们认为今天更重要的还是争取和维持更多的学术批判性自主,只有这样才能在权力以外找到另一种思路,权力特有的准则是将“事务管理”的长期稳定与“人的治理”的不稳定混为一谈。

笔者曾请教蓝克利先生,他是这样解释的:“通过采取对知识的批判性立场,历史学者努力独立于权力之外,获得某种自主性。追求功利的权力所依赖的历史叙事,遵循这一准则:存在这样一些代表善或恶的集体主体,其定义既宽泛又绝对,对于可能挑战这种善恶划分的社会和文化矛盾,皆保持沉默,随之隐去的是个体的行动及其追求的多元而复杂的利益和目标……这种叙事逻辑致力于表现一种简化后的公共生活,追求以单一的方式定义的善,公共事务如此看来显得日常且稳定。这种稳定性之下,所有出现的问题都有不言而喻的答案,没有任何张力,也没有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冲突。因此,人的政府可以混同于对这些事务的长时段良好治理。”面对当下的人工智能所带给人文学科的挑战,我们也不妨这样引申理解:人工智能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一种功利性,甚至是一种新的权力,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叙事逻辑很大程度上是将复杂的人类生活、表达、互动,都作为数据来处理,结果是呈现出一个没有解释冲突、没有张力的看似“不言而喻”的答案。数据是可以统计的,但人类行动的动机永远是复杂而多元的,这正是需要历史学者、人文学者努力研究与理解的地方。

五、结语

布罗代尔和白乐日在历史学和汉学上的合作与对话,试图回答的是历史学如何更好地解释人类经验的终极问题,依托的是社会经济史的坚实基础。这一理想虽经历了白乐日个人的多舛命运,却在以蓝克利为代表的法国宋史研究中以一种低调却坚定的方式延续下来。从宋代的历史地理到社会经济史,到水利史,到财政史,再到制度史、政治史……涉及方方面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年鉴学派对经济史、地理学重视的深远影响,也可以看到在社会科学问题意识下法国宋史学界如何利用纷繁复杂的宋代史料。在年鉴

学派与法国汉学研究的结合中,文史哲与社会科学展开了跨学科的研究互动。如果说白乐日在与布罗代尔的合作中更多是向布罗代尔提供有关中国的知识支持,那么蓝克利的研究则更进一步,通过对中国更深的理解,在思想和理论层面反哺年鉴学派。

蓝克利作为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努力,不仅仅在于如何更准确地解读一条宋代的史料(当然其对宋代史料的精准解读是其历史研究的坚实基础),更是经由宋史研究,追寻历史学在当今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他以宋史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史料研究也似一面明镜,从中可以看到西方思想史呈现出复杂交错的脉络,而海外中国史的研究以及中西历史的对话或许正可以促进西方思想界找回其传统中被忽视的部分,或为其悬而未决的问题找到另一种思考的角度。

本文得到了邓小南教授、葛兆光教授、赵冬梅教授宝贵的指导和建议,在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注释:

① Christian Lamouroux, *La Dynastie des Song—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960–1279)*(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22).

② 18世纪前期法国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曾翻译《中华帝国全志》,见孙健:《文献与学术——宋代典籍海外流传与欧美学界宋史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年。

③ 蓝克利对白乐日的评述,转引自萨班(Françoise Sabban)2011年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法国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见阮洁卿:《法国“中国中心”与当代中国研究(1958–)》,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第44页。关于白乐日,相关生平与学术贡献见戴密微著,尹磊译:《戴密微对白乐日学术贡献的评价》,《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20年第22期;另见 Françoise Aubin, "Sinologie et politique. Autour d'Etienne Balazs(1905–1963)," *Études chinoises* 27(2008): 147–160.

④ 白乐日与日本宋史学界学术合作紧密,国际宋史研究计划还包括了以下日本学者:青山定雄、石田幹之助、中島敏、仁井田陞、和田清、山本達郎、羽田明、池田誠、日野海三郎等。需要补充的是,日本宋史研究有其自身的传统,诸如“唐宋变革论”等论断深远影响了英文学界,白乐日的国际宋史研究计划贡献在于进一步深刻地将欧美、日本的宋史研究紧密连接为一个整体,使宋史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显学,得到广泛而持久的关注。

⑤ Maurice Aymard, "Etienne Balazs et Fernand Braudel," eds. Pierre-Étienne Will and Isabelle Ang, *Actualité d'Étienne Balazs(1905–1963): Témoignages et réflexions pour un centenair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2010)37-66.

⑥中译本有两个版本,分别是布罗代尔著,肖昶、冯棠、张文英、王明毅译:《文明史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布罗代尔著,常绍民、冯棠、张文英、王明毅译:《文明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⑦布罗代尔于1960-1962年间,曾说服法国教育部,推行新的历史教育大纲,他负责撰写高中毕业班教材,虽然推广的时间很短,被历史督察司(Inspection générale d'Histoire)认为该教材过于革新。布罗代尔撰写的部分最后仅作为个人著述出版。

⑧ Maurice Aymard, "Etienne Balazs et Fernand Braudel," eds. Pierre-Étienne Will and Isabelle Ang, *Actualité d'Étienne Balazs(1905-1963): Témoignages et réflexions pour un centenair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2010)37-66.

⑨阮洁卿:《法国“中国中心”与当代中国研究(1958-)》,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第49页。

⑩ Fernand Braudel, Etienne Balazs, "Une Carte des centres commerciaux de la Chine à la fin du XIe siècl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12. 4(1957): 587-593.

⑪该处引用鄂法兰教授(Françoise Aubin)代表法国学界共识的评价,原文如下:"Il ne fait pas de doute que, quatre décennies après sa disparition prématurée, le maître que fut Étienne Balazs(1905-1963)a enfin trouvé un véritable héritier dans son pays d'adoption, la France."("毫无疑问,在白乐日早逝四十年后,这位大师终于在法国找到了他真正的继承者。")Françoise Aubin, "Christian Lamouroux, Fiscalité, comptes publics et politiques financières dans la Chine des Song. Le chapitre 179 du Songshi, (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volume XXXIII), 2003," *Études chinoises* 23(2004): 546.

⑫贝尔纳·勒帕蒂是年鉴学派第四代回归社会史的核心人物。见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54页。值得注意的是,伯克指出:"作为1986年至1992年《年鉴》杂志的秘书,勒帕蒂曾写过两篇引起热议的社论(署名“年鉴”),讨论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关键转向’。……1994年杂志改名为《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体现了与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展开更密切合作的办刊方针。勒帕蒂对历史写作中的尺度问题,特别是微观史走向也颇感兴趣。”

⑬ Christian Lamouroux, *Fiscalité, comptes publics et politiques financières dans la Chine des Song*(Paris: Collège de France/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2003).

⑭ Aubin Françoise, "Christian Lamouroux, Fiscalité, comptes publics et politiques financières dans la Chine des Song. Le chapitre 179 du Songshi(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volume XXXIII), 2003," *Études chinoises* 23(2004): 547.

⑮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⑯ Christian Lamouroux, "Endettement public, Trésor impérial et monnaies dans la Chine des Xe et XIe siècles," eds. Jean Andreu and Gilles Béaur, *La Dette publique dans l'histoire*(Paris: CHEFF, 2006)129-174.

⑰ Christian Lamouroux, "Bureaucratie et monnaie dans la Chine du XIe siècle: les désordres monétaires au Shaanxi," eds. Bruno Thérét, *La monnaie dévoilée par ses crises-crises monétaires d'hier et aujourd'hui*(Paris: EHESS, 2007): 171-204. 该论文集还收录了蓝克利合著的一篇论文"La fiduciaire des monnaies métalliques: une perspective historique," eds. Bruno Thérét, *La monnaie dévoilée par ses crises-crises monétaires d'hier et aujourd'hui*(Paris: EHESS, 2007): 265-303.

⑱ Bruno Thérét, "Les trois états de la monnaie. Approche interdisciplinaire du fait monétaire," *Revue économique* 59. 4 (2008): 813-841.

⑲ Pierre Alary, Jérôme Blanc, Ludovic Desmedt, Bruno Thérét, *Théories françaises de la monnaie*(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6).

⑳ François Lerouxel, "Le Marché Du Crédit Privé, La Bibliothèque Des Acquêts et Les Tâches Publiques En Égypte Romain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67. 4(2012): 943-976.

㉑ 参见 William Guanglin Liu, "The Making of a Fiscal State in Song Chin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8. 1(2015): 48-78. 另见 William Guanglin Liu,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另见刘光临、关荣匀:《唐宋变革与宋代财政国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2期。

㉒ Christian Lamouroux, *La Dynastie des Song-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960-1279)*(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22) 404-405.

㉓㉔刘光临、关荣匀:《唐宋变革与宋代财政国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2期。

㉕ 1991年的《北宋的领土管理与榷茶制度》、1996年的《礼仪、空间与财政——11世纪中国的主权重组》,以及2004年与邓小南教授合著的《“祖宗之法”:中古中国的皇帝权威与政府》。

㉖ Christian Lamouroux, "Qualification des hommes et procédures administrative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33(2000): 26-31.

㉗ Jean-Frédéric Schaub, "La notion d'État moderne est-elle utile? Remarques sur les blocages de la démarche comparatiste en histoire," *Cahiers du monde russe* 46. 1-2(2005): 51-64.

㉘ Christian Lamouroux,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Mili-

tary Organization in Song China, Tenth–Early Eleventh Centuries," eds. Juan–Carlos Garavaglia, Michael J. Braddick, Christian Lamouroux, *Serve the Power(s), Serve the State*(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6)275–316.

⑲ Christian Lamouroux, "Fragmentation and Financial Re-centraliza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Four General Commands (1127–1165)," eds. Hilde de Weerd and Julius Morc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and European History, 800–1600*(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1)105–141.

⑳2022年10月18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中心举办《中国通史——宋代卷》的研讨会。蓝克利教授在研讨会上提及该书的核心方法论是历史人类学。

㉑ Serge Berstein, "L'historien et la culture politique,"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35(1992): 67–77.

㉒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第141页。

㉓“长时段”共出现三次,分别是人口史部分,围绕人口迁移、耕地等;思想史部分,围绕宋儒阐释经典的冲突,需要回应的挑战;以及民间信仰部分,通过9至15世纪的崔府君信仰来探讨相关问题。

㉔阿兰·盖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史方向,论文发表于《年鉴》等期刊。

㉕ Alain Guery, "Institution. Histoire d'une notion et de ses utilisations dans l'histoire avant les institutionalismes," *Cahiers d'économie politique* 44(2003): 7–18.

㉖ Christian Lamouroux, "Organisation territoriale et monopole du thé dans la Chine des Song(960–1059),"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46. 5(1991): 977–1008. Christian Lamouroux, "Rites, espaces et finances—La recomposi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ans la Chine du XIe siècle," 51. 2(1996): 275–305. Christian Lamouroux, "Frontières De France, Vues De Chin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58. 5(2003): 1029–1039. Xiaonan Deng, Christian Lamouroux, "Les 'Règles Familiales Des Ancêtres': Autorité Impériale Et Gouvernement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59. 3(2004): 491–518. Christian Lamouroux, Xiaoping Dong, "La fabrique des droits hydrauliques: Histoire, traditions et innovations dans le nord de la Chin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66. 1(2011): 33–67. Christian Lamouroux, "Longue Durée Et Profondeurs Chronologiques,"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70. 2(2015): 359–365.

㉗ Daniel Nordman, *Frontières de France, de l'espace au territoire, XVIe–XIXe siècle*(Paris: Gallimard, 1998).

㉘蓝克利主要提及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在20世纪30至50年代,以及施坚雅在20世纪60至80

年代的研究。

㉙蓝克利另有专文探讨施坚雅的大区理论, Christian Lamouroux, "Les pérégrinations d'un modèle géographique(1965–2002)," *Études rurales*, 161/162(2002): 263–271.

㉚此文翻译见蓝克利著,戎恒颖译:《长时段和年代深度》,《西方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三辑。本文本节对这篇论文的探讨部分附于该译文后作为背景介绍。

㉛大卫·阿米蒂奇是享誉国际的全球史和思想史家,现任哈佛大学“贝兰克梵讲席教授”(Lloyd C. Blankfein Professor of History)。见李汉松、大卫·阿米蒂奇:《国际思想史——对话大卫·阿米蒂奇》,《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张艳丽:《全球思想史视角下的〈独立宣言〉:以大卫·阿米蒂奇的研究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章可:《论阿米蒂奇与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史林》2015年第3期。2013年阿米蒂奇曾提出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2013年9月在台北创刊的《思想史》学刊在第1辑中就开设专题论坛,刊发阿米蒂奇《思想史的国际转向》的中译文,由五位从事东亚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包弼德(Peter Bol)、葛兆光、李蕾(Leigh Jenko)、慕唯仁(Viren Murthy)和孙隆基]进行评论,并请阿米蒂奇做出回应。阿米蒂奇的思想史“国际转向”中已有关于重视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理论探讨,思考将长时段理念与思想史实践相结合。

㉜英语完整版见 Jo Guidi & Davi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http://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 发表于《年鉴》的法语版本见 David Armitage & Jo Guidi, "Le retour de la longue durée: une perspective anglo-américain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70. 2(2015): 289–318. 中文译本见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著,孙岳译:《历史学宣言》,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相关探讨见胡成:《“后现代”之后的史学“长时段”——关于超越“新文化史”的反思》,《史林》2020年第1期。

㉝此处蓝克利也引用了莫里斯·艾马尔(Maurice Aymard)对布罗代尔的研究为佐证。见 Maurice Aymard, "Etienne Balazs et Fernand Braudel," eds. Pierre–Étienne Will and Isabelle Ang, *Actualité d'Étienne Balazs(1905–1963): Témoignages et réflexions pour un centenaire*(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2010)37.

㉞见莫里斯·弗里曼(Maurice Freedman)为其所译葛兰言著作所作的序言 *The Relig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Oxford: Blackwell, 1975)。

㉟此观点亦呼应朱维铮先生在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上的主张,即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乃至学术史、经学史,都没有一个一以贯之、恒定不变的“传统”,要回到历史环境中找到当事人的真实经验。

㊱ David Armitage, Jo Guldi, "Pour Une «histoire Ambitieuse»: Une Réponse à Nos Critiques,"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70. 2(2015): 367–378.